

王船山辯証法 思想研究

者斯二者均之生無殊也而
又奚以殊未生而生之自生
若也已生而益之引其生者
也自生者天而乾坤之道在



52

王 船 山 辩 证 法 思 想 研 究

方 克 著



湖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四 · 长 沙

王船山辩证法思想研究

方克 著

责任编辑：邓潭洲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湘潭市彩色印刷厂印刷

1984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07,000 印张：10.125 印数：1—3,000

统一书号：2109·43 定价：1.60 元

目 录

第一章 王船山朴素辩证法思想形成的历史条件	(1)
第一节 社会大变动的时代	(1)
第二节 思想大清算的时代	(6)
第三节 艰难曲折的生活道路	(10)
第二章 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相结合的	
典型形态	(15)
第一节 表现在“气”范畴的规定方面	(15)
第二节 表现在“理气”观方面	(27)
第三节 表现在“道器”观方面	(30)
第四节 表现在“心物”观和“心理”观方面	(39)
第五节 表现在“有无”观方面	(43)
第三章 自然观中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49)
第一节 阴阳对立统一的矛盾观	(49)
一 “阴阳摩荡而生变化”	(49)
二 阴阳“相峙并立”、“相反相仇”	(57)
三 阴阳“相倚相涵”	(64)
四 “阴阳无咎”、“相背相通”	(71)
五 “两一”论与“一多”观	(75)
六 “中庸”新解	(85)

第二节 “动”、“静”对立统一的运动观·····	(93)
一 “动”与“静”的辩证关系·····	(93)
二 “气化日新”、“推陈致新”·····	(99)
三 “善动物”、“趋时更新”·····	(111)
第三节 “常”、“变”对立统一的变化观·····	(114)
第四章 历史观中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121)
第一节 今胜于昔的进化史观·····	(122)
一 历史进化论及其对历史退化论的批判·····	(122)
二 “治统”与“道统”·····	(131)
三 “无其器则无其道”与“因时革新”·····	(134)
第二节 “理势”合一的历史发展规律论·····	(137)
一 “势成理”和“理成势”·····	(140)
二 “变”、“时”、“几”、“假”或“庸”·····	(145)
第三节 上下“交逆”、治乱循环和《易》变礼常 的历史矛盾运动论·····	(153)
一 上下“交逆”·····	(153)
二 治乱循环·····	(157)
三 《易》变礼常·····	(159)
第四节 “即民以见天”的历史发展动力说·····	(161)
一 “圣人”重用“民之天”·····	(162)
二 “民心之大同”·····	(170)
第五节 “述往以为来者师”、“得失皆资”的历史 研究方法·····	(171)
第五章 认识论中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178)

第一节	“因所以发能，能必副其所”的认识来源	
	论	(179)
一	“能”与“所”的关系	(180)
二	驳“生而知之”说	(186)
三	“心”与“理”的关系	(190)
第二节	“格物”与“致知”相结合的认识过程	(204)
一	论“格物”	(206)
二	论“致知”	(209)
三	论“道”与“德”、“博”与“约”、“学”与“思”、 “一”与“多”、“浅”与“深”的关系	(213)
第三节	“行”中求“知”、“行可兼知”、“知行相 资以为用”的知行观	(225)
一	“行”中求“知”	(227)
二	“行可兼知”	(232)
三	“知行相资以为用”	(244)
第四节	“延天祐人”与“以人造天”的“天”、“人” 关系说	(250)
一	“以天为宗”与“以人为归”	(250)
二	批判在“天”、“人”关系上的错误观点	(256)
三	“延天祐人”	(259)
四	“以人造天”	(262)
第六章	人性论中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269)
第一节	“命日受，性日生”说	(269)
第二节	“继善成性”论	(276)

第三节	“理欲”合一论·····	(287)
第七章	王船山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历史地位·····	(301)
第一节	我国古代辩证法的集大成者·····	(301)
第二节	创立了以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相结 合的思想体系·····	(310)
第三节	在辩证法方面的突出贡献及其局限性·····	(313)
第四节	在历史上所起的进步作用·····	(316)
后记	·····	(319)

第 一 章

王船山朴素辩证法思想形成的历史条件

王船山（公元1619——1692年），原名夫之，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因他晚年隐居衡阳之石船山，故后人称他为船山先生。他是明末清初地主阶级中主张革新的进步知识分子，是反对满洲贵族侵扰的当时的爱国主义者，也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思想家。

作为辩证法思想家，他不仅是我国古代朴素辩证法思想的集大成者，而且还根据时代的某种需要，把我国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推进到当时所可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他之所以有这样的成就，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凭借一系列历史条件，毕生从事艰苦的、批判的理论思维的结果。

王船山的朴素辩证法思想的产生，除有其理论渊源外，主要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下面，就简要地谈谈这个问题。

第一节 社会大变动的时代

王船山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充满着各种深刻矛盾的大震荡、大分化、大变革的时代。宋代以后，我国封建社会逐渐走向没

落阶段，到明朝晚期，这个社会的一切固有矛盾都彻底暴露了。比王船山略早的进步思想家吕坤描绘当时的社会危机说：“民心如实炮，一点而烈焰震天；国势如溃瓜，手一动而流液满地。”

（《去伪斋文集》卷5《答孙月峰》）当时，阻碍社会前进的，主要是封建生产关系越来越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社会生产和商品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已经产生；但另一方面，封建剥削空前严重，自然经济还占统治地位，微弱的资本主义萌芽还远不足以取代封建生产关系。因之，这是一个“死的拖住活的”而“活的”又力图突破死的势处于“不得不变”的时代。王船山本人朦胧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一方面说：

“世益降，物益备”（《读通鉴论》，卷十九），认为时代愈前进，生产愈发展，物资愈丰富；另一方面又指出：“鸷吏以其繁刑驱民而之死，民死亡而国入益困。上狠下怨，成乎交逆”（《诗广传》，卷三）；“强豪兼并之家，皆能渔猎小民，而使之流离失所。”（《读四书大全说》，卷一）这是说，封建统治者、地方豪强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人民已经生活不下去了。

在明末互相交织的各种社会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是地主和农民的矛盾。当时，明王朝在政治上实行极端的中央集权与极端的君主专制制度。贵族、官僚、大地主控制了全部政权，进行残暴腐朽的统治；在经济上向人民征收苛重的赋税，并疯狂地兼并土地，造成了野蛮的经济掠夺。在这样的情况下，广大农民濒临破产境地，“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以致“三家之村，鸡犬悉尽，五都之市，丝粟皆空”（《明史·王宗沐传》）。王船山看到当时劳动人民遭受剥削的惨况，不禁为之“寒

心而慄慄”。（《黄书·大正》）广大农民饥寒交迫，不得已铤而走险，纷纷起义。1627年，陕西白水县农民王二首举义旗，“一夫揭竿，而天下响应。”（《诗广传·卷四》）农民起义军经过十七年的苦战，1644年，李自成率领百万农民军打破北京，终于结束了明王朝的统治。后来，高必正、李定国、李来亨等率领的几支农民军，又是抗清斗争的主力。农民起义以及他们提出的“割富济贫”、“均田免粮”的口号，对王船山辩证法思想的形成是有影响的。后来他在著作中揭示的“物极必反”、“相反相仇”等论点就是明证。

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产生了市民同封建势力的矛盾。明朝中叶以来，我国江南一些地区，在农业、手工业发展和商品经济空前繁荣的基础上，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作坊。史称当时从事纺织和制瓷的佣工，多者聚集上千，甚至上数万人。例如苏州纺工“什百为群”，“延颈而待佣用”，“每桥有行头分遣。”（《古今图书集成·考工典》）景德镇制瓷业的佣工“皆聚四方无籍之徒，每日不下数万人。”（光绪《江西通志》萧近高《参内监疏》）农村也产生了经营地主。在王船山的家乡湖南地区，手工业、商业也有很大的发展。据史籍记载，衡州府“地产铅锡，多利，富商大贾，贸易其中。”（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湖南产茶，其直贱，商人率越境私贩。”（《明史·食货四》）长沙府和宝庆府的茶叶远销欧亚。湘潭县“沿江十余里，皆商贾列肆”，“帆檣舳集，连二十里，廛市日增，蔚为都会。”（《湘潭县志·赋役》）平江、武冈、邵阳一带的造纸作坊，季节工人常达数千人。但是这些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幼芽，却遭到了封建统治者的严

重摧残，因而引起了市民、织工和矿工的不断反抗。例如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苏州就出现了著名的以葛贤为首的织工罢工斗争。从十六到十七世纪末，这类斗争出现过四百多次。仅在湖南，就有万历二十四年湘潭、宝庆的“民变”（《明实录》），万历三十六年临武、蓝山“矿盗”之变（《续文献通考》），崇祯十二年桂阳、常宁等地的抗税斗争。后来，市民和矿工的斗争同农民起义军日趋汇合，如李自成起义军著名将领刘宗敏就是铁匠出身。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要求，曾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注意。显然，这对王船山辩证法思想的发展是有一定影响的。

在阶级矛盾尖锐化的同时，民族矛盾也日益激化。满族军事贵族趁明王朝政治腐败、内部分裂之机，不断地入侵。1614年，满族军事贵族利用吴三桂投降的机会，引兵入关，颠覆了大顺农民政权，建立了满汉大地主联合专政的清王朝，并进而摧毁了几个南明政权。这就是王船山所谓“大运倾覆”、“地裂天倾”的巨变。（《春秋家说叙》）满族贵族入关后，实行了圈占老百姓土地、严追逃人和颁布薙发令等民族压迫政策，迫使汉族人民进行了激烈的抗清斗争。这种情况，对王船山的辩证法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明朝后期，地主阶级内部的大地主与中小地主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当时由皇族、外戚、宦官、官僚与勋旧等构成的大地主阶层，依仗自己的特权，除对广大农民肆行压榨外，还对中小地主进行排挤、打击，引起了中小地主的反抗。代表中小地主和一部分开明士大夫利益的知识分子的民间结社，前有

东林，后有复社，他们与当权的大地主阶层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到清初，地主阶级内部又有新的分化。一部分大地主投降了清朝，成为清朝镇压抗清运动的先锋；另一部分大地主在几个南明小朝廷窃据要职，贪婪横暴，严重地削弱和破坏了抗清力量。此时，广大的中小地主则在抗清主力——农民军——的影响下，积极地投身于火热的抗清斗争。他们同意联合农民军抗清，却没有也不愿意参加农民军。他们之中有的和市民团结在一起，作市民的喉舌（如黄宗羲）；有的则同市民联系较少，但也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反映了一些市民的要求（如王船山）。地主阶级内部这些错综复杂的分化和斗争情况，对王船山辩证法思想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明清之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时代的呼声，由农民起义以武装斗争的最强音表达了出来，可是，农民起义军由于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却被联合起来的满族军事贵族和汉族反动大地主镇压下去，当作了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但是，应该指出，以农民起义军为主的汉族人民（包括中小地主在内）的抗清斗争，乃是清代前期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还应看到，明末地主阶级改革派要求革新的愿望虽已落空，但他们却在明亡以后，不出仕清朝，专心讲学和著述，承担了从思想领域里反映时代精神的历史任务。王船山就是其中的一个杰出代表。

王船山面对当前的政治形势和社会矛盾，从中小地主的阶级利益出发，揭示了自己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主张，概括说来，就是要“循天下之公”，实行政治改革，建立一个以汉族为主体、没有民族压迫、实行君主开明专制、选贤任能、轻徭薄赋、

社会经济繁荣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主义国家。王氏这个改革蓝图，虽然标榜为“循天下之公”，但在实质上，乃是要求限制封建君主和大官僚、大地主的政治、经济特权，使中小地主（还有经营地主和富农）的利益不受侵害，并减轻对农民（主要是自耕农）的剥削，稳定小农经济，从而缓和阶级矛盾，增强国力，复兴民族国家，巩固封建主义的统治。然而，这样的改革，在当时还是阻力重重，难于实现。为了冲破阻力，达到改革的目的，王氏不得不在思想上主张“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和强调“趋时更新”，以作为革新的理论基础。

由此可见，王船山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是我国十七世纪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特别是尖锐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反映，是明末清初剧烈的社会变革的产物，也是当时地主阶级改革派要求革新的理论表现。

第二节 思想大清算的时代

王船山从事学术研究的时代，是一个既拥有丰富的历史遗产而又充满各种激烈的思想斗争的时代。

仅就哲学思想来说，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朴素唯物主义与朴素辩证法思想，是在与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斗争中发展的。经过先秦时期的天人之争、名实之争、法先王与法后王之争以及性善、性恶之争，它得以显扬，而荀况集其大成。两汉时期，董仲舒的神学目的论和以后出现的谶纬神学，经过王充等唯物主义者的批判而告一段落。魏晋南北朝时期，何晏、王弼的玄

学，受到裴颢的批判；而佛教宣扬的“神不灭论”，也受到范缜的《神灭论》的驳斥。唐代以韩愈、李翱为代表的哲学唯心主义，经过柳宗元、刘禹锡的批判而黯然失色。宋明时期，封建统治者鉴于过去孔孟的天命论、董仲舒的神学目的论以及佛道的宗教神学，由于农民起义运动的冲击，自然科学的发展，加上历代地主阶级中的一些进步思想家的批判，已经越来越丧失了它们的欺骗作用，于是就利用和扶植一种“新”的反动思想——理学，来加强思想统治。理学是渊源于孔孟儒家学说而又糅合佛、道而炮制出来的，是一种更为精巧圆滑、更加哲学化了的僧侣主义。它起着一种特殊的欺骗作用，用“以理杀人”来补充以礼法杀人之所不足。理学创始于北宋周敦颐，尽管后来有不同的流派，但不论是客观唯心主义的程朱学派，还是主观唯心主义的陆王学派，其所宣扬的都是理论思维形式掩盖下的僧侣主义。

自北宋理学兴起以后的五百年间，唯物主义哲学家对理学感到不满，有的还与之进行斗争，但结果都没有占上风。北宋时，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的唯心主义，盛行海内；而以张载为代表的气一元论者，虽然对之表示异议，然“信从者寡”，影响甚微。到南宋，朱熹把理学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精致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虽有唯物主义者陈亮、叶适等人起来反对，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理学。到明代，王守仁绍陆九渊之学说而加以发扬，把主观唯心主义更加系统化，不仅与程朱学派分庭抗礼，而且驷骖乎将上之。在这种情况下，罗钦顺、王廷相、方以智等从不同角度对理学（包括程朱学派和陆王学派的思想）

进行了批判，但是也没有批倒理学。

由上述情况可以看出，王船山从事学术研究的时代，正是处在“坐集千古之智，折中其间”（方以智《通雅·考古通论》）和“贞邪相兢而互为畸胜”（《张子正蒙注·序论》）的时代。就是说，处在一个面对丰富的多方面的思想遗产，需要去总结和消化的时代，处在一个需要把反理学的斗争进行到底，从根本上批倒理学的时代。

讲到“坐集千古之智”，这里还要提到明代后期自然科学的重大成就。明代在数学、天文学、地理学、物理学、冶金、化学、水利、建筑、农学、生物学和医药学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发展，而纺织、冶炼、制瓷、制糖、造纸、印刷和造船等手工业的规模和技术，也都有相当程度的扩大和提高。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著作，系统地总结了我国古代农业、手工业技术和医药学、生物学等方面的重要成就，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在这里，我们还要提到下述事实：1547年左右，马一龙著《农说》，记载了水稻种植经验，并用阴阳二气的互相作用来分析和说明耕作技术的原理，提出“知其所宜，用其不可弃；知其所宜，避其不可为，力足以胜天”的论点。1637年，宋应星在《论气》中提出了物质不灭的观点，他认为一粒种子长成一棵树以至树被烧成灰烬，即是从“气”化成“形”而又从“形”化成“气”的过程。并不是无中生有和有归于无。他还认为声音是由物体冲击气体而产生的，声音的传播同水波相似。1652年左右，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中说：“宙（时间）轮于宇（空间），则宇中有宙，宙中

有字。”也就是提出了时间和空间彼此不能单独存在的观点。他还在《物理小识》中正确地解释了蒙气差（即大气折射）现象。他说：“气映差……置钱于碗，远立者视之不见。注水溢碗，钱浮水面矣。此犹日未出而水光浮。”明代董谷（生卒年月不详）在《豢龙子》中揭示了具有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的关于宇宙演化的思想，他认为宇宙是没有开端的，但具体的天体系统则是有起源的。他说：“或问天地有始乎？曰：无始也。天地无始乎？曰：有始也。未达，曰：自一元而言，有始也；自元元而言，无始也。”这是天才的猜测。1608年，明代邢云路（生卒年月不详）在《戊申立春考证》中测得一回归年为365.242190日，这已接近准确了（今测值为365.242193日）。十五世纪，我国已经大量冶炼金属锌，有的纯度高达99%。1596年，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了二百七十六种无机药物的化学性质以及蒸馏、蒸发、升华、重结晶、沉淀、烧灼等技术。1652年左右，方以智记载了炼焦炭的方法。与他同时的孙云球（1628——1662）曾制造放大镜，察微镜等七十种光学仪器。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记述冶炼技术时，把铅、铜、汞、硫等许多化学元素看作是基本的物质，而把与它们有关的反应所产生的物质看作是派生的物质，说明当时已有化学元素概念的萌芽。明代中叶以后，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开始传入我国。1607年，徐光启等翻译欧几里得《几何原本》。1613年李之藻翻译《同文算指》，欧洲数学开始被引入我国。但是当时的耶稣会教士是绝对维护基督教义和中世纪的封建秩序，反对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和自然科学的，因此他们传入中国的大多是托勒玫的地球

中心说一类东西，对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就禁止传入中国。所以，我国从利玛窦等人手中所取得的自然科学知识是有限的。

上述情况表明：明代后期的自然科学和技术是有较大发展的。这对于王船山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形成，或多或少地、或直接或间接地产生过某种影响。不过，应该看到，当时的自然科学还只出现实证科学的萌芽，因而王船山的哲学思想还不可能超出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的范围。

王船山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就其理论形式来说，是他对我国古代源远流长的辩证法传统加以继承和改造的结果；是他在同各种形而上学思想作斗争的过程中汲取某些合理的因素，用以充实自己的理论的结果；是他接受当代自然科学的影响的结果。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一种先进的思想，“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4页）

第三节 艰难曲折的生活道路

王船山一生走着坎坷不平的道路。他出身于中小地主家庭。早年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企图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1644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打破北京，明王朝覆灭。不久，清兵入关。这接连发生的事变，使王氏的“学而优则仕”的美梦破灭了。在现实生活的教训下，他从仇恨农民起义军逐渐转变为同意联合农民起义军共同抗清。他不但积极发动了衡山的抗清起义，而且在南明永历朝廷中，他为了扫除抗清斗争的障碍，坚